

爱国外交官黎庶昌与“伯乐”丁宝桢

黄江玲
贵阳学院

[摘要]爱国外交家、著名散文家黎庶昌，一生仕途中得到两位“伯乐”的识拔。一位是曾国藩，被曾纳入门下，朝夕相处七八年，保荐为直隶州知州。另一位“伯乐”丁宝桢，密荐黎庶昌为外交储备人才，由总理衙门存记在案。黎庶昌被征调为参赞，从此改变人生历程，在外交战线创造出光辉业绩。而丁宝桢密荐黎庶昌之事，鲜为人知。

[关键词]黎庶昌的外交之路；“伯乐”；丁宝桢

【DOI】10.12252/j.issn.2096-6261.2021.12.908

清代对官员的升降，实行“三年考绩”之法，对京官的考绩称“京察”，外官称“大计”。考察标准有“四格”：守、才、政、年。分别给予考语。优者分称职、勤职、供职三等。三等之外的劣者，则按“六法”予以处置。或降级、或革职、或致休。由吏部考功司掌管其事。而考语则由长官（如督抚等）题写。除此之外，朝中大员和地方督抚有“密荐”之权，对所发现的有为之才，向皇帝上疏荐举，以备急需时擢拔选用。对于有才之士来说，举荐者堪称为“伯乐”。晚清的爱国外交官黎庶昌，一生中遇到两位“伯乐”，一位是曾国藩，有许多历史资料谈及，另一位是丁宝桢，则鲜为人知。

黎庶昌（1837-1898），字莼斋。贵州遵义人。出身世代书香门第，自幼熟读经史，有宏伟抱负。同治初元向皇帝上“万言书”，指陈时弊，提出改革方案。清廷嘉许，赐知县衔，发往曾国藩江南大营（在安庆）差遣委用，并考察其才具。

当黎庶昌因上“万言书”而恩赏知县衔时，引起部分朝臣的不满。有位任陕西道御史的吕序程上疏表示反对，其奏折中说：“臣阅各条，率多摭拾史书，议更定制，似未免生今反古之弊。宋臣王安石以官礼误苍生，盖由食古不化，以致贻害无穷。今该员是否才识博洽，抑或胶固不通；即其恳辞官职，是否自安恬退，亦或貌似谦恭，巧占地步，学术心术，均未深知。且片纸敷陈，立致显达，诚恐此风一开，天下纷纷，尽图尝试，亦易开悖进之渐。”

这些刁难，早在黎庶昌的预料之中，他在辞谢恩赏疏中曾说，这种破格擢拔，“将启后来尚口之风，难逃贤者诛心之议。”吕序程提出处置办法：“可否旨飭下曾国藩，俟该员到营时，留心查看。如果实有真才，自应随时保举；如或迂疏寡效，恃才妄作，亦据实甄别。”

曾氏幕府人才济济，黎庶昌初来时并未引起注意。后得知是郑子尹先生门生，便调来作文案。从此，黎庶昌与曾国藩朝夕相处达六年之久，并拜曾为师，攻习桐城派古文，与张裕钊、薛福成、吴汝纶同称“曾门四弟子”。

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。黎庶昌未随之北上，留江南补缺。曾国藩向皇帝回禀对黎庶昌“悉心查看”“据实甄核”情况。奏折中附片说：“臣查黎庶昌到营以来，先后六年，未尝去臣左右。北征以后，追随臣幕，与之朝夕晤对。察看该员笃学耐劳，内怀抗希先哲、补救时艰之志，而外甚朴讷，不事矜饰。臣于同治二年十一月密保一次，又于续保克复金陵水陆等军，暨铭传军攻克黄陂案内明保两次。奏请以直隶州知州留于江苏，遇缺即补。均经奉旨允准在案。今臣交卸督篆在即，该员系特旨差委人员，既无经手事件，不必随臣前往直隶。亦无须补

行引见，应即归于江苏，听候补用，除该员服阙，由新任督臣马新贻咨部起复外，理合附片具陈。”

经过六年多的查看和甄核，曾氏给出的考语是“笃学耐劳，内怀抗希先哲、补救时艰之志，而外朴讷，不事矜饰。”先后受密保一次，明保两次，举荐的官衔是直隶州知州。直隶州属于省，州长官正五品，既亲掌一州治理，又辖有二三属县。有“遇缺即补”的优先权。当时正值平定太平天国之后，候补官员极多，两江地域，补道员就有千多人，州县官候补者多如牛毛，要补实缺，确非易事。

马新贻上任不久便遭刺杀，成为有名的“刺马案”。黎庶昌补缺之事被搁置，他被江苏巡抚丁日昌聘入幕府，给了个署理吴江县的职位。但工作不顺，漕运亏空。曾国藩调回两江总督任后，与新任江苏巡抚张之万协调，调黎庶昌署理青浦知县，稍有建树。曾氏于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辞世，不久，黎庶昌也卸任赋闲。

为求生计，得新任两江总督李宗羲的帮助，谋得淮阳堤工支应的差事。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调扬州管荷花池厘金局榷务，报解羨余一万多两白银。次年调通州管理花布厘捐榷务。失去了恩师曾国藩的保荐、提携，黎庶昌沉沦下僚，瞻念仕途艰辛，一派茫然。正在这时，忽然传来喜讯，调任外交官参赞，从此人生和仕途发生重大转折。
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十月，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，檄调黎庶昌充三等参赞。黎庶昌与郭氏素无往来，不知为什么会调他去作外事官。后来才得知，是故乡的贤哲丁宝桢的“密保”。

丁宝桢时任山东巡抚，在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得到朝廷举荐外事人才的谕旨，便于同年八月上了保举折《保举薛福成、黎庶昌暨徐建寅创办机器片》，该附片写道：

再，臣维中外现在交涉事件迭起环生，储才不预，无以应变。第风气以奖掖而自开，人才以磨炼而后出。博求通识之士，砥砺讲求、遇事器使，异日必有为国家任事之人。本年四月间，王大臣议准出使一节，荷蒙谕旨，飭各督抚各举所知，以备任使，最为今日切要之图。

臣查知府銜直隶候补同知、直隶州知州薛福成，学堪致用，识略闳深；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黎庶昌，志节坚毅，抱负甚伟。以上二员，均拟请飭下总理衙门存记，遇事酌量奏请简用。……

当时世俗的眼光，把外洋各国视为“夷狄”之邦，野蛮落后。如大学士倭仁认为“彼等之风俗，不过淫乱与机诈，而彼等之所尚，不过魔道与恶毒”。时人把与洋人打交道、出使异邦视为奇耻大辱。郭嵩焘出任公使，湖南老乡写对联讥讽他。黎庶昌一反世俗偏见，把出国任职视作寻求强国之术的良机。他的好友张裕钊积极支持庶昌出洋，借以深入细

致地考察西洋各国情形，探求西人兴盛富强之道，以便“神而明之，利而用之”，特写《送苑斋使英吉利序》以壮行色。《序》结尾写道：“苑斋之贤，其必能心不喻乎此，以俟异时受任国家之重，而副海内之望也。它日归，吾将从而讯之。”给予黎庶昌殷切期望和极大的鼓舞。

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仲冬，使团由上海乘轮赴英国。黎庶昌时年四十岁，由此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历程，十几年的外交生涯由此启航。

黎庶昌没有辜负“伯乐”丁宝楨公的期望，外交战绩表现特出，不辱使命。

黎庶昌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柏林（当时译名伯尔林）任使馆参赞，为时不长。曾纪泽出任驻英、法公使，调黎庶昌赴法国巴黎，以二等参赞主持驻法使馆事务，代表中国参与多种政务和社会活动，知名度颇高。

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十二月，黎庶昌任参赞三年期满，理应销差返国。曾纪泽在《参赞期满销差拣员补充疏》中，对庶昌的外事工作做了这样的“考语”：“该员远涉重洋，历襄使职，和平接物，黾勉从公，办事三年，毫无贻误，实属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才。”⁵循例保擢黎庶昌知府衔。

正整装将归时，清朝出任美、日、秘公使陈兰彬路过巴黎，特聘黎庶昌为驻日斯马尼亚（今译西班牙）使馆参赞，主持使馆事务。于是，庶昌赴马德里任职两年。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清廷擢升黎庶昌为记名道员，赏给二品顶戴，派充出使日本钦差大使，并命其赴京陛见。回程途次，庶昌再度出游西洋诸国。

在欧期间，庶昌先后游历十国，写有《西洋杂志》8卷，对各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及社会风情作了详细描述，被誉为“十九世纪西洋风俗画卷”。

黎庶昌返国后，于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九月赴京拜见慈禧太后和皇帝，十二月赴日任公使之职。他与日本汉学家结交，深入了解日本国情，对“明治维新”的成功十分赞许。他吸取东洋和西洋各国富国强民的经验，熟虑精思，写出一套革新方略，以《敬陈管见折》于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向皇帝上书。此折以“整饬内政，酌用西法”为指针，提出治国理政六大方略：一、水师宜急练大支。练足百艘战船，保卫海疆。二、京师宜修治街道。拓宽路面，设自来水火，仿西人管理办法，使国体民生两有裨益。三、火车宜及早兴办。这是西洋富强之术，便官、便商、便民。四、公使宜优赐召见，改进外交礼节，建崇宏巨丽的迎宾馆。五、商务宜重加保护。发展工矿企业，支持各行公司。六、度支宜预筹出入。作财政预、决算，平衡收支。

每一项都有中西情势对比分析，列有实行举措，操作性强。庶昌抄录副本寄李鸿章、曾纪泽，二人看后很欣喜，有复信，评价很高。曾纪泽信中说：“假令朝廷嘉采硕画，实见施行，则中国之富强，可以计日而待。倘再因循粉饰，意见纷歧，则杞人之忧方未已也。”李鸿章信中对各项方略非常赞赏，但很担心：“惜当轴未能尽知，即嘉纳未必施行，解人难索，可为叹息耳！”结果，此折被总理衙门以“其情事不合，且有涉忌讳处”为由，寝而不奏，原折退回。黎庶昌游洋八年所寻得的强国之道，永被抛弃，强国之梦，化为泡影。

十年之后，中日海战失败，人们才想起黎庶昌的革新方案来。若被采纳施行，单是练就百支战船一项，就会让日本

不敢轻举妄动。

总之，丁宝楨这位“伯乐”所识拔的黎庶昌这匹“千里马”，在外交战线得显身手，由“三等参赞”成长为驻日公使，成独当一面的干济之才，未负丁公的期望。

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末，黎庶昌丁母忧，由日本公使任上返故里守制。此时，丁宝楨在四川总督任上。

为给父亲黎愷公写《墓志铭》，庶昌特请恩师曾涤生先生撰文，大约于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前后成稿。后赴京陛见时，恭请大学士李鸿章篆盖。这次返乡，又恭请丁公书丹，付石工刻成，入土。入土前，曾拓有拓片一张。21世纪初，丁宝楨书丹的拓片，辗转被遵义文化学者李连昌先生搜得，公诸报端，引起学术界注目。

丁公所书《黎愷公墓志铭》，大约完成于光绪十一年（1875年），次年，丁公便与世长辞。这次书丹，是否是黎庶昌亲往成都恭请，无资料记载，没法考证。丁公欣然挥笔，算是给黎庶昌极大的面子，让《墓志铭》成了晚清三大名人的杰作，堪称“三绝碑”。

丁公逝世后，成都、济南的士绅们请准，修建“丁宫保专祠”祭祀丁宝楨公。而筹建贵阳的丁公祠，最合适的人选应是唐炯，但他因中法战事被关入天牢。于是，黎庶昌自告奋勇，亲赴贵阳，召集众多乡绅会商，评述丁公毕生功绩。如云：

当咸丰之际，黔乱肇兴，苗教并发，省垣兵饷两绌，坐致困毙。各省方救死扶伤之不暇，何有蚍蜉、蚊子之援？丁公毁家起乡兵，击贼捍闾里，由近及远，救安平、援贵阳，勦平越、瓮安、麻哈，守都匀，驰驱五六年，军事稍定，省城危而复安。其后北平捻匪，护援京师，中原肃清，抚山东，督四川，前后且二十年，勋尤磊落，动宙合。而其平曰植躬俭介，志意皎然不欺，有禹、墨之遗烈，使顽懦皆起。黔自建省以来，名臣硕望接踵代兴，考其勋德之隆，未有如丁公者也。

接着谈论黔籍几位名臣死后的祭祀情况：

李恭勤尚书也，治行为乾隆间最；杨勤勇果勇侯也，平定新疆、川陕；王壮节、朱勇烈、王勇壮，大臣死绥者也，或裂尸断臂，或累世效忠；刘松斋天下之清官也，教匪之乱，无役不从；唐威恪则名臣而蹈节者也；以至石侍郎抗天津之难，陶文节殉都匀之守。然通祀不过名宦，祠不过昭忠、乡贤，未有旌特殊异之典，岂朝廷忘之哉？毋亦乡人简忽，无任事之过也。

李恭勤即李世杰，黔西州人；杨勤勇即杨芳，封果勇侯，松桃人；王壮节即王文雄，玉屏人；朱勇烈即朱射斗，贵筑人；王勇壮即王凯，贵筑人；刘松斋即刘清，广顺州人；唐威恪即唐树义，贵筑人；石侍郎即石赞清，黄平州人；陶文节即陶廷杰，都匀人。他们都在名宦祠、昭忠祠或乡贤祠中“通祀”，未有个人专祠。黎庶昌接着讲明为丁公建专祠的原由：“今丁公勋德尤盛，若醮金请建专祠，事既应法，且慰乡人仰止之思，感发兴起，钦耸来哲，其于臣道未必无裨！”众绅都同意庶昌的提议，于是由四十八人联名申请，上言巡抚潘蔚，由潘公上报朝廷，光绪十一年（1886年），得圣旨俞允。

次年，唐炯出狱，以巡抚衔赴云南督办矿务，路过贵阳，经理建祠之事，由前叙永厅同知华国英佐之。又次年落成。祠建于贵阳雪涯洞昭忠祠附近。黎庶昌撰写《丁文诚公

专祠碑》的碑文，记述建祠缘起及过程。碑文之末，写了颂辞。辞曰：

图云兮关东，烂朝日兮瞳眈。纷龙蛇兮在户，叛陆离兮新宫。豆笾陈兮咽箫鼓，罗满庭兮惟黔士女。公之灵兮亘霄，骑箕尾兮回翔以下。子弟兮八千，被犀甲兮彗戈铤。勇气之兮昔日，相患难兮后先。孰为生兮孰为死，公之灵兮宜顾而喜。悲游子兮故乡，魂魄犹思兮乐此。顾公留兮勿归，公归去兮黔士心悲。抚瑶华兮延伫，建芳馨兮以遗我来者。臣有则兮士有师，我铭质兮公知之。

这正是黎庶昌对“伯乐”丁宝楨的回报。

黎庶昌守孝期满，于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暮春启程赴京销差，取道川北入陕，经晋、冀入都，沿途写有《丁亥入都纪程》，逐日记录见闻及考察情况。在成都逗留时，多处记述与丁公相关的旧迹。

寓居成都贵州会馆，发现其东院为尹王祠，是唐炯（鄂生）办理黔盐边岸时所建，奉祀汉儒尹道真和明儒王阳明，丁公撰有楹联云：“凿西徼以遥通北海，近守远宗，极晦时自分皂白；遵邛崃而上溯尼山，殊形同体，讲学家何用雌黄。”

庶昌去灌县省曾祖父梅溪公之墓，途经竹瓦铺时，发现有“丁宫保功德祠”。在玉垒山麓找到梅溪公墓道及祖父安理公刻的石碑，作了详细记录。扫完墓，赴二王庙观览，发现“山下有丁公祠，供文诚公长生禄位、塑像颇肖，今易额曰‘贤良祠’”。丁公督川，重修都江堰水利工程，疏通各支干渠，恢复荒芜多年的成都平原数百万亩良田，造福民众。川人不忘丁公，为他建生祠祝其长享禄位。庶昌这位受惠者，自然时刻记挂恩公。

根据清制，对文官的考核有一套严格的程序。各级官员按制接受分级考核，外省官员“大计”分为卓异、供职两等。出考呈报督抚，督抚“乃遍察而注考焉。”督抚的考语，必须以下级上报内容为基础，以实迹为依据，具体详实登注在册，不能随心所欲填注，要核其事而论其等。如果注考错误，官员要受到处分：“大计注考舛错、遗漏，系由司、道、府、州、县等官开报者，将开报之员罚俸一年，督抚罚俸六个月；其由该督抚自行注考者，将督抚罚俸一年。”对于事迹突出，以“卓异”上报的，则更加强调荐举的责任和事迹的真实性，以律法明文规定：“州县卓异例由道府等具结保送，督抚率同两司核实具题、如道府等并无保送文揭，系该督抚商同两司混列道府衔名作题者，准该道府立即呈请更正，或督抚等有抑勒情事，许该道府直揭部科，将督抚两司均革职。倘道府隐忍不举，至所保之员贪劣事发，始行申辩，将该道府仍照本例降二级调用。”¹⁰对于无功无过的平庸官员，无能力却将其荐为卓异的，或隐瞒贪污劣迹的都要受革职或降级处理。“荐举以后别犯有贪酷劣迹，原荐举之各上司仍与该员同在一省，于未经发觉之先查参者，亦免议。倘别经发觉，查系有意袒护者，将督抚降三级调用，司、道、府等官降二级调用（俱私罪）。其止失于觉察者，将督抚降二级调用，司、道、府等官降一级调用（俱公罪）。如原荐举之上司已不与该员同在一省，而所犯事迹仍在该上司未经离任之先者，亦照此分别议处。若所犯在该上司离任之后，无从揭报题参者，将督抚降二级调用，司、道、府等官降一级调用（俱公罪）。其有经同荐举官查出揭参，将离任无从揭报之上司一体免议。”被荐举官员日后有

劣迹，举荐人也会受到牵连。

清朝制定的一系列考绩制度严格完善，对吏治整肃起到了监督、警示、惩治作用，也有相当的激励作用。有能力的人可以靠着荐举获得成就事业的机会，而对荐举人来说则存在一定风险。可见，彼此无亲戚关系、无亲密往来的情况下，丁宝楨能举荐黎庶昌实属胆识过人。

从上保举折一事来看，就丁公而言，表现出他能武的一面。勇于担当，一心为公，慧眼识人。在这样一个历史变革时代，有着极锐利的眼光及开放的思想。致力于自强救国的洋务运动，认为要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创办机器局，引进国外机器设备，制造西洋枪炮火药。选举能人贤士为国家储备人才。同时在与如黎庶昌之列的后辈交往中，也充分表现出他典型的文士风格。文人相惜，不唯功利。在保举后，无具体史料可证其与黎庶昌的交往密切程度，但为其父亲亲书碑铭可见其对黎庶昌及其家族的认可，这是以文人心态表现出来的惜爱之情，不为讨好，不为扬名，只为表明对乡贤的尊敬与珍爱。

而从另一方面看，举荐一事看似一桩小事，但它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，使一个原本可能默默无闻、了无生趣度余生的人在中国外交历史上留下重要史迹，在散文史上也占有了一席之地。黎庶昌出使日本，在外交活动中坚决维护国家尊严，在无意获知日本意欲出兵朝鲜时机敏果断地上报朝廷，避免战事发生；同时出使日本期间，为中日友好做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。而在旅欧时写的杂记，更是以生动鲜活的笔触带给国人以清新特异的感受，开阔了国人视野，成为走出封闭乡村，“睁眼看世界”的第一人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参见黄万机《黎庶昌评传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第二次印刷，第38页。
- [2] 《丁文诚公奏稿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11，第1196页。
- [3] 引自马士《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》第二卷第206页。
- [4] 转引自黄万机《黎庶昌评传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，第60页。
- [5] 见黄万机《黎庶昌评传》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2年第二次印刷，第70页。
- [6] 见《黎庶昌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，第219-225页。
- [7] 以上引文，见《黎庶昌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，第84-85页。
- [8] 见《黎庶昌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，第303-305页。
- [9] 转引自艾永明，《清朝文官考绩制度及实施状况》，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03年第5期，第149页。
- [10] 转引自艾永明，《清朝文官考绩制度及实施状况》，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03年第5期，第149页。

基金项目：2019年度贵阳市科技局-贵阳学院专项资金项目。项目编号：GYU-KYZ（2019-2020）YB-02。

作者简介：黄江玲，女，贵阳学院教师，研究方向：贵州地方文化。